

# 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治理危机及趋向

——以公民权利为视角

李艳霞

**摘要:**当前,作为公民社会权利的重要制度保障,福利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其中日益推进的全球化进程无疑是造成福利国家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化不仅使市场领域不断扩张,侵蚀着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也从根本意义上削弱了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经济、政治基础,冲破了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范围界限。面临困境,福利国家只能在其原有体制框架的基础上作出适应全球化的制度调整。

**关键词:**全球化;福利国家;公民社会权利;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5)06-0038-06

福利国家自产生以来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福利国家汇集了自由、民主、公平、效率、程序正义、实质正义等各种不同甚至相悖的价值理念,成为众多理论流派争论的焦点,伴随着福利国家的繁荣、危机、改革等不同发展阶段,人们对福利国家危机与出路的探讨不断地深入,在这种探讨中,全球化无论作为福利国家困境的“元凶”,还是福利国家发展的平台都是理论界热衷的焦点问题。本文拟在政治学的学科领域内,对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危机根源及发展路径予以分析。从公民权利的视角出发,本文认为保障公民社会权利是福利国家的重要职能,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冲击也主要表现为对公民社会权利实现基础的削弱。

## 一、福利国家:公民社会权利的现实保证

福利国家是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在理论研究和现实生活中广为使用的概念,理论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福利国家既是一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方法,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是一种治理途径,更是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手段,不同的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释福利国家的内涵。但是这些阐释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以国家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来阐释福利国家的内涵,而公民作为福利制度的另一端往往被置于完全被动的位置,甚至被忽略了。其实,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福利国家是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从公民的视角出发,福利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对个人、市场和之间责任关系的界定,是公民社会权利的制度保障。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福利国家产生的历史就是公民在国家领域以及公共领域中不断争取社会权利的历史。

**作者简介:**李艳霞,政治学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从国家领域来看,虽然现代意义的福利国家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但是人们对国家社会功能的需求从国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产生了。在西方思想史上,把国家与公民现实的物质、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早已有之。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西塞罗就把国家称作“人民的事业”。西方近代人本主义的出现使人摆脱了国家工具的地位而成为国家的目的,政治共同体就更被赋予了为公民提供生活保障的责任。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后,公民的福利需求就真正找到了诉诸的对象。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在一个公共场合呼吁:“当人民无法为自己获取一种对于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时……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并且为人民提供这种东西。”<sup>[1]</sup>因此,福利国家作为公民社会权利的制度保障突出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位置,是以突出强调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福利国家是国家主义的。”<sup>[2]</sup>

公共领域是人类现代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领域之一,它的形成与完善是公民各项权利义务形成的母体,尤其对于公民社会权利的取得来说,公共领域中各种利益团体与利益诉求的形成更是至关重要。在西方的传统中,社会福利历来是社会集体本身的功能,是教会的工作,是家人、朋友、邻居、社区成员之间互相帮助、排忧解难基础上的具有宗教色彩的慈善事业。也就是说,福利工作本身就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组成要素之一。民族国家诞生,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类自然权利及其与国家之间契约关系等以人为本的思想的广泛传播促使统治者逐渐接管了原属于宗教领域的慈善事业,国家开始介入社会领域,承担社会职责。虽然如此,公共领域依然是国家福利制度产生与完善的主要动力源泉,这在欧洲福利国家产生的过程中集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工会的出现以及其代表性政党的产生。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生产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领域同时出现了重大变革,这就是“福特制”<sup>[3]</sup>的产生。福特制积累模式在把资本主义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扩大到最大程度的同时也使雇佣工人进一步实现了内部的统一化与平均化,相同的境遇与环境使雇佣工人有着相同的利益诉求,工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种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协会与组织相继产生。发达的福特制生产机构内部联系十分紧密,技术上极怕干扰,即使很小规模的罢工行动也会使整个生产流程全部陷入瘫痪,这种特征使工人相对增长的实力进一步加强。这些都为工人阶级内部形成的团结互助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战斗组织——工会乃至其代表性政党创造了前提条件。可以说,工人阶级的斗争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社会改良方面,公共领域中除了各种慈善组织对于福利国家产生的作用之外,各种社区服务中心的形成对国家社会政策专业化的演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1884年,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巴纳特在伦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社区服务中心,称之为“汤因比馆”,就是最早的社会政策专业化的雏形。它对于现代社团组织以及社区工作的创立和发展都有重大的作用。还有英国社会改良主义派别“费边社”,它注重缓进的社会改良和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互助互爱社会服务,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立法渠道实现财富和权利的再分配。它还主张政府应该改善其服务质量,缩小与私营部门的差距,减轻社会分化。费边社提出了许多关于福利国家的建议,在建议中可以看到现代社会政策的某些目标和基本特征。有学者评论说:“该政策是以福利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是一种只有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理解的政治过程”。<sup>[4]</sup>总之,福利国家作为保障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制度,它的运作以融合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利益进而实现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为目的,而各种利益诉求的产生以及表达都依赖于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以及个人权利思想的盛行,促使了公共领域内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各种利益团体的产生,尤其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与工会的形成成为福利国家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基础。

福利国家作为公民社会权利的制度保障,它的建立使人们抵抗自然、社会各种风险的能力得到了加强,从而使人们摆脱了僵化制度的枷锁,为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自我设计和自我选择提供了基础。可以说现代福利国家这一复杂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

## 二、全球化浪潮对公民社会权利实现基础的削弱

从福利国家的产生的历程可以看出,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是以公共领域和国家领域的独立和完善为前提的,它的实现也有其必要的基础和保证。在全球化浪潮不断席卷世界的今天,市场领域的无限度扩张不断

侵蚀着国家领域与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权利得以顺利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必然在很大程度的受到了削弱和冲击。

### (一) 市场领域的扩张及其对国家、公共领域的侵蚀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显地感受到全球化对于我们生活的显著影响,但是对于全球化的具体分析却很难用只言片语说得清楚。约翰·格雷(John Gray)对于全球化的定义似乎概括出了经济全球化最为本质的特征,他把经济全球化定义为“由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和不加束缚的自由贸易所促进的工业生产和新技术的世界性扩展。”<sup>⑤</sup>全球化的出现是资本扩张的产物,大型企业不断向国外扩张,在国外建立机构,前所未有地对外投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拓展不仅成就了一批规模庞大、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更重要的是,这些跨国公司在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如果说“大政府”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大公司”似乎已经站到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这些到处安家落户的企业不可遏制地制造出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区域性或国家性的爱好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少。商业贸易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决定着人们的感受和观察,在这种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最大程度的获取利润——被发挥到了极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每个民族都犹如一家大公司,在世界市场上与其它民族展开竞争。”<sup>⑥</sup>对于生产基地、劳动力成本等全方位的竞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市场和资本在这种竞争中实现着前所未有的扩张,而受损失的是那些依靠高额税收才得以维持的社会福利政策。康采恩老板以及受其威胁和指使的统治者在这种竞争与利润的诱导下确立了一个答案:“向下调整”,于是公民们不断的被一种放弃福利要求的嘈杂的禁欲宣传所包围。社会福利国家变成了“未来的威胁”。

市场领域的急剧扩张和市场竞争性文化的普遍盛行不仅直接对社会福利政策构成威胁,而且也形成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公民社会权利有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市场领域的扩张不断侵蚀和削弱着公共领域和国家领域。对于公共领域来说,市场帝国主义的出现对其无疑是一场灾难。公共领域是指那些与国家权力运作、治理、公民参与、公民社会意识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话语和行为模式。当公民以一种不受限制的方式——即组织和集会的自由,公开表达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讨论普遍利益问题时,他们是作为一个公共实体而发挥作用。在一个更大的公共实体中,这种交流就需要特殊的方式以传送并让其他人接受信息。可是,在市场帝国主义横行的今天,公共领域已经在极度扩张的资本商品化中出现了极度萎缩的趋势。这种萎缩表现为深层的非政治的历史化过程、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的缺失、公共话语的日渐狭隘以及对于古希腊人来讲极具价值的政治社会的消逝。“没有什么比公司扩张的过程更能削弱公共领域的基础、抽取政治话语的精华了。”<sup>⑦</sup>公共领域商品化了,这是全球资本在其疯狂控制人类生活各个领域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贪婪、竞争、侵略和暴力等力量的牺牲品。公共领域的商品化与衰落直接威胁到公民权利的产生与实现,而福利制度作为公民社会权利的制度保障,在这种“市场帝国主义阴影”的笼罩下更是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与公共领域一样,国家领域也受到了市场领域的侵蚀。经济全球化以惊人的速度推进,许多跨国的大公司努力的追求着它,同时又成为它的最重要推动力。在前现代,国家本身就是人们生活的目标。而进入近代社会,尤其是进入现代化阶段,国家所具有的合法性成了国家能否获得统治的必然要求,这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合法性论证的标准设定就成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由于“冷战”的结束和资本的无限扩张,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集中于经济的增长之上。这就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其它目标(或者这些目标乃是更为本源意义的目标,而经济则只是这些目标的手段)则被掩埋在经济目标之下。战后的福利国家可以说是福利社会的重大成果,但是“现在却变成了单单的成本因素”。<sup>⑧</sup>全球化似乎要把社会福利国家变成竞争国家。“新兴的全球化国家经济使国家自治范围变得更小,也使国家决策者不断丧失诸如利率控制和公共支出水平等关键的经济管理领域的控制力,因此经济的全球化给经济管理、市场规则和不受国家控制的生产系统带来了很多问题。”<sup>⑨</sup>在资本这支力量面前,不仅国家向企业发布命令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国家不断的受到威胁和控制,任何公民权利的实现最后都将诉诸于民族国家,而福利国家则是国家主权得到很大程度强调的产物,国家领域的非政治化无疑对公民权利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阻碍。

### (二) 全球化浪潮削弱了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经济基础

所谓公民的社会权利就是指由所有公民普遍享有的能够使其获得一种体面生活的福利、安全和教育。而公民社会权利实现所需的物质和各种机会的提供是以国家对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进行再次分配为基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是由资本带动,由“真实经济”和由国际性投机及债券、股票交易所组成的“虚拟金融经济”构成。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金融投资的不断推进,全球化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对它们的投资政策的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寻找劳动与社会成本最低的地方以及税制与市场监管制度对它们最有利的地方,目的是把效率最高化、利润最大化。全球化下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了“涡轮资本主义”和“赌场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利润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完成,资本、生产以及知识的迅速转移必然会造成大范围的资本外逃现象,从而使民族国家的税源大大受到侵蚀。这种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使国家在与资本的对垒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决策者不断丧失诸如利率控制和公共支出水平等关键经济管理领域的控制力。各国政府不仅无法利用提高资本收益率的政策来维持公民社会权利实现所需的费用,而且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国家不得不在金融市场上卷入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为跨国公司降低税率的竞争,这无疑又降低了国家的重要税源。税收的降低和国家对国内投资控制力的减弱必然削弱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经济基础。

### (三) 全球化浪潮削弱了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政治基础

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社会福利计划,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的目的就是在国家、资本和工人阶级之间达成一种妥协与合作的关系,以求得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实现国内的稳定和整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遭到内部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威胁和外部共产主义制度的竞争压力,福利制度就不会发生。”<sup>⑩</sup>正是工人阶级反对雇主无情剥削的斗争才会形成国家、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关系,公民的社会权利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以实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为了加强本国在国际上的经济竞争力量,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了“强资本”“弱劳动”的发展策略。作为公民社会权利实现基础的国家、雇主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三方社会伙伴关系”出现了向资本一方的倾斜。而且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展开,各国的劳动者呈现分散化就业的态势,劳动力市场的“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也使传统的大集中、大生产相对减少。科技革命带来的网络化也使人们的工作地点更为分散,个性化更为明显。再加上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这些都使原来那些大批标准而熟练的劳工群体呈现松散化与零碎化的趋势,这无疑会使原来在工人阶级之间的亲密的利益纽带松散下来。再加上外国移民的增加,部分时制和临时制工人的增加更加使原来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的代表性受到质疑。工会组织的弱化导致其与雇主及国家的谈判能力的下降,工人作为一种集体化的力量便显得越来越难以组织起来与强大的资本相抗衡。这些都更加助长了资本日益强大的态势。并且,“冷战”的结束,在西方资本主义看来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最终获得胜利的表现。全球化浪潮既是自由资本主义继续扩大的原因,也是自由资本主义扩大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快速摆脱外界与内部对资本扩张的束缚,走上“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作为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政治基础——“三方社会合作伙伴关系”自然也在这种扩张中岌岌可危了。

### (四) 全球化浪潮冲破了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范围界限

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依靠本国的税收,其服务对象也是本国国民。也就是说,公民社会权利实现是以国家、资本和劳动三者之间的边际重合为条件的。全球化以开放性为主要特征,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甚至劳动都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而逐渐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这种开放性的本质与公民社会权利的边界性就会形成极大的冲突。不断出现的劳务输出是国家的各种福利制度在实施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断输入的外国移民又使国家的福利制度面临着不断扩大的财政压力,这些都使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陷入困境。

## 三、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新趋向

福利国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形态,它体现着国家中心主义的现代思想。现代的福利国家是建筑在制度不

尽相同的民族国家的藩篱之内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前出现的全球化趋势是造成福利国家困境的重要原因。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渐明显,福利国家今后的发展和变革不仅不能摆脱全球化的大背景,而且还要作出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变化。

### (一) 全球化与福利国家的外化

福利国家本身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概念而在人们的理论和实际生活中出现,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福利国家通过各种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对国家、社会、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责任予以了不同于以往的重新界定。在全球化的崭新背景下,“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的框架和实际内容以及其中所涉及的相互关系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国家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逐渐缩小,而社会的意义在上升。社会生活开始突破国家的界线,发展到可能意义上的全球范围,国家不再是自给自足、自我定义的最高实体,而是成为世界历史体系的一个结构性要素。随着私人空间的延伸和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扩展,社会的意义也在量度和质度双重意义上扩大了。在这种大环境的作用下,传统福利国家所设定的那种国家、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责任联系已经不再具有其应该发挥的效力。所以,福利国家今后的发展首先就应当采取措施以适应这种全球化的环境。欧洲是世界上社会福利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典型的福利国家聚集之地,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步伐也随之加快。所以,欧洲福利国家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趋势大体上反映出福利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

欧洲统一大市场在很早就已经形成,目的就是帮助产品、服务、资本以及人员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优化。但是在欧洲统一市场形成的时候,统一的社会福利机制并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甚至连在欧洲联盟的层面上直接操作的最低社会标准也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但是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欧洲一体化的形成不断加速,这种形式给欧洲民族福利国家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迫使福利国家走向了外化的道路。尤其是进入欧盟阶段和欧洲货币一体化之后,建立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欧盟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从目前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基本情况看,要达到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目标至少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欧盟社会保障一体化需要建立在统一的公民权的基础上。因为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公民社会权利的制度体现都限定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这种权利对于本国公民是平等的,对外国公民则不是开放的。所以如果在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能够将原来局限在各个成员国的公民权体系转移到欧盟的层次,即建立起“欧盟公民权”的政治、法律和社会体系,将为其社会保障一体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反过来说,欧盟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公民资格”的建立。为此,在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专门有一部分明确提出了建立欧盟公民权的问题,并对欧盟的公民权的范围做出了规定。按照马约的规定,“具有其成员国籍的人都是欧盟的公民”,“都具有本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欧盟公民的社会权利方面,此条约规定所有的公民都具有在欧盟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居住的权利。其次,欧盟社会保障一体化涉及到成员国家的权利变化,其中主要包括决策权和行政权的变化。社会保障一体化涉及到一系列政策制定和社会行政管理问题。任何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都必须建立在一个统一的决策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基础上,因此,福利国家的外化还需要有像一国政府那样的决策能力的外部组织。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欧盟开始对各成员国的社会政策进行越来越具体的指导。从建立社会救助的共同标准到在欧盟的层面上进行社会目标和社会政策的协调,进而发展到1999年通过决议,为跨国服务和跨国社会保障金的发放规定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欧洲联盟在整个联盟的范围内逐步地协调经济和社会政策,并且向世界宣告欧洲人所需要的社会模式是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双层结构模式。这种模式应当尊重人的价值,但又要适应市场向全球化方向的发展;它既要保留福利国家的边界和民族特色,又要在共同市场中寻求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的新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民族福利国家不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际的社会政策制定中都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取向。并且,围绕着新的标准,一些超国家的社会机构也相继建立,如欧盟委员会、欧洲社会政策专家委员会、欧洲法院以及欧洲议会等。因此,决定福利国家的政治因素就由原来的仅限于国内的政党和利益集团扩大到了外部的政治势力。总之,欧盟一方面在制定凌驾于福利国家之上、约束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另一方面在取消一些不利于单一市场发展的有民族国家特征的制度,从而干涉到福利国家传统的社会管理、社

会控制、社会保护等权利领域,使福利国家的发展出现了外化于民族国家社会功能领域的现象。

## (二) 福利国家内部的适应性调整

造成福利国家困境的原因除了外部的全球化的因素外,还有僵化的福利制度与变化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因此,福利国家要想摆脱困境必须对福利制度自身做出适应性的调整。这些调整可以通过欧洲社会民主党在福利国家改革问题上的若干共识体现出来。对于欧洲福利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对福利国家改革的战略问题上达成以下共识:第一,虽然就业政策仍然是福利国家政策的关键,但并不是全部,就业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而且,充分的就业政策不仅应满足男人的就业,实现男女平等且充分的就业是当前就业政策的关键。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风险的形式和种类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明智的福利国家”应当以积极的预防态度来对待这些核心的风险,除了“社会支出”,福利国家还应当参与“社会投资”。第三,必须增加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或通过向雇主提供补贴的方法补贴低技能工人,并且还要加强教育和培训的投资。第四,提供津贴只是为达到公平分配负担与利益的一种手段。因此对其评价应当以长期的社会和政治效益为主,在政治上要设法赢得多数人支持,他们认为公正的社会在于分配工作。从以上共识可以看出,虽然近年来福利国家出现了重大变革,但是福利国家的衰退程度至今为止都是有限的,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社会民主公民资格国家的福利调整都局限于边际性的调整上。由于福利国家与一国的公民资格模式有着密切的决定关系,所以不同公民资格模式的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和发展的方向也有着不同。以社会民主公民资格模式为主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总体上仍遵循着福利国家的扩大就业战略;而自由主义公民资格模式的国家则赞成结束工资管制和劳动力市场,并与某种程度上的福利国家削弱相结合;传统公民资格模式的欧洲大陆国家则尽量促使劳动力减少,同时基本保持现行的社会保障标准。总之,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调整总体上体现出从资源调整向社会关系调整的转变。如果说以往的福利政策是从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分离出来而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的话,那么当前福利国家的发展趋向则是确立国家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在经济政策中体现出机会与能力的再分配。

欧洲各国福利国家的各种变化也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乃至二者与自身关系认识的变化。随着公民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增强,公民对社会生活的主动作用也不断提高。因此,公民本身将逐渐摆脱仅仅接受财物的被动地位,公民权利也将逐渐实现私人向公共性的转变。并且,虽然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但是民族国家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还是不可替代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对一国的福利制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福利国家的发展必将是资本主义制度与公民资格不断调节和融合的产物。

### 注释:

①转引自顾俊礼主编:《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②Gunnar, Myrdal,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economic plann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0.

③所谓“福特制”就是指把工厂的生产劳动过程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生产阶段,在每个阶段中雇佣非技术工人和半熟练技术工人从事单调重复的手工操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流水线作业”。“福特制”发源于美国,由于它在减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效率方面的突出成效而迅速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④严幸智:《西方社会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其理论基础初探》,载《社会学》2002年第2期,第90-93页,第91页。

⑤Gray, John,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Books, pp. 6, 7.

⑥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⑦[美]卡尔·博格著:《政治的终结》,陈家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⑧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⑨Axford & Barrie, *The Global System: Economic, Polit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cy Press, 1995, p. 102.

⑩[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页。